



老地方 老故事

当常熟路是善钟路的时候,这里还是法租界。作家、文人们常在善钟路出没。这条幽静的小马路,为何会吸引人呢?

常熟路是跨静安、徐汇两段的一段“小”马路——自华山路到淮海路,全长

不过700米。它原名“善钟路”,

路名源自马车行老板陶善钟。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,在上海租界内并不多,可见陶善钟来历不凡。

可惜,有关陶善钟的历史记载很少。现在的常熟路100弄10号,有一幢豪宅,据说是陶氏住宅,现为上海歌剧院用房。抗战期间,陶宅曾被周佛海任总裁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占用;抗战胜利后,划归同济大学医学院。现在,它挂着“优秀历史建筑”铭牌,是迄今最能令人联想到“陶善钟”和“善钟路”的历史遗存。

租住在西式公寓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作家、文人们常在善钟路出没。这条幽静的小马路,为什么会吸引人呢?一是这里有法式的浪漫风情,交通也方便。当年的法商2路电车,就在善钟路上行驶,“法国风”的善钟路可以直达“中国风”的南市老城厢;另外一个原因,是二十世纪初,善钟路还属上海的“西部”,这里陆续建造的西式公寓、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住宅等,租金相对便宜。

1927年8月,田汉应黎锦晖邀请,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任文科主任(后任校长)。艺大的校舍,就在善钟路87号。这是一幢私人洋房,上下两层,底楼为客厅和餐厅,楼上为正房。艺大资金不多,房内放上钢琴和画架,就成了教室。在这里,田汉带着一张行军床,日夜镇守。他生性豪爽、朋友多,有人说他是“一团火”。在他感召下,欧阳予倩、洪深、朱穰丞、徐悲鸿、徐志摩、余上沅和郁达夫等文艺大家,几乎都来87号艺大讲学。

当年冬天,田汉在87号组织艺术“鱼龙会”,让艺大学生(“鱼”)与社会名流(“龙”)合作汇演。很快,87号底楼被改造成“小剧场”,连续一周演出话剧《名优之死》《苏州夜话》等名剧,欧阳予倩、周信芳、高百岁、徐悲鸿、徐志摩和陆小曼等悉数到场,或登台演出,或出席捧场。很多艺大学生,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文艺名家。音乐家冼星海、剧作家陈白尘、画家吴作人、诗人塞克、电影导演郑君里、电影明星王莹和金焰等,就是从87号走出来的。

也就在1927年,林语堂来到上海,租住在善钟路一套西式公寓。他雇了一个男仆,名叫阿芳,只有十几岁。阿芳动手能力强,会打扫房间,也会擦皮鞋。有一次,林语堂的打字机坏了,阿芳一捣鼓,居然修好了。对此,林语堂很是喜欢。后来,公寓里又来了一位洗衣女仆,阿芳就变得懒散,动手能力也弱了。有一天,林语堂偶然发现,阿芳与女仆有私通的痕迹……终于,阿芳走了,林语堂很怅惘。最后,他自己也搬离了善钟路。

1928年1月,26岁的沈从文到达上海,住进了善钟里(善钟路111弄和113弄)。善钟里为新式里弄,原有花园洋房和里弄住宅几十座。沈从文当年穷困潦倒,租不起大房子,只能租住在3号一个亭子间里(后迁入正房)。那时,他每天除了写作应付催稿外,生活非常单调:“每天早上起来烧水,洗脸,买菜,淘米,煮饭,炒菜,打油,洗碗,头发昏。”有时候无聊,就跑到晒台上,看对面楼房亭子间里住着一个女人,“明知无所冀于这女人,却有时不免故意走到晒台上去”,看这女人做事看书,也看她脱衣上床,“老早的起床,预备看这女人起床时的模样,而心情,又不过类乎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……女人还仿佛做着好梦,侧面睡。在晒台上的俯瞰,是望到这脸非常明白的,脸在一堆短的黑发中,呈浅红色,花花的浅黄色被上有一只光光的白手同时入目,这应当说是美。”在沈从文眼中,“这女人”,是灰冷的善钟里唯一的暖色。

1928年3月,丁玲和胡也频也来到了善钟路,住进沈从文的陋室。丁玲、胡也频与沈从文原是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,曾在北京一起合租过汉园公寓。沈从文回忆道:“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……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,别无他物,于是,两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。”



原恩派亚公寓(今淮海大楼) 读史老张摄



今日常熟路 读史老张摄

当常熟路是善钟路的时候

读史老张

文人们的聚集地

除了在善钟路租住,文人们也常在这条路上活动。

1929年,梁实秋住在霞飞路1014弄,离善钟路不远。有一次,他与妹夫时昭涵、朋友罗隆基走到善钟路口,看到一个法国人正在殴打一个中国司机。他们就上去劝解,时昭涵用法语骂了那个法国人。没想到,法国人突然狂吹警笛,一时间,善钟路巡捕房的巡捕倾巢出动,将时昭涵抓了进去,梁实秋和罗隆基也跟了进去……后来,梁实秋在《警察》一文中称:“我在善钟路捕房亲眼看到,一个警官用手枪抵住一个犯人,另一警官就像在沙袋前练拳一样,两拳齐施,直打得犯人鼻青脸肿……”

1934年,沙汀、杨骚和杨潮等作家们经常聚在欧阳山家里。欧阳山当时住在善钟路,他们谈文学、谈创作。据沙汀回忆:“……杨潮每次去参加,大半都要捎上一瓶泸州大曲,因为他知道欧阳、杨骚和我,还有他自己,都对杜康有点感情。”

女作家白薇和郁风也常走善钟路。1935年,中共领导的青年妇女俱乐部刚刚成立,白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。据郁风回忆,白薇“把这个青年姐妹的群众组织当作寄托感情的温暖的家。我们都尊重她……我当时还不到二十岁,比较幼稚,只是快快活活地干革命工作。白薇大姐对我还有些偏爱,每次会后常常和我一起出来,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善钟路,到我家喝一杯茶”。郁风说的“我家”,就是善钟路上的郁公馆。郁公馆主人,是郁风的父亲郁华。郁华是郁达夫胞兄,也是著名大法官。1939年11月23日,因坚持抗日、拒绝日伪利诱,郁华被汪伪特务暗杀。暗杀地点,就在善钟路上。

1935年底,端木蕻良和一位中学同学也在善钟路租住。端木蕻良说,那时,他同学在中山医学院(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)读书,平时不在家,他独自一人,埋头写作,“《大地的海》就是那时写出的……《大地的海》我一口气写完,很顺畅。当时我对上海文坛是十分陌生的,我也不想结交什么人,只想把写出来的东西发表,使它和读者见面,然后再继续写……”后来,端木蕻良在谈到当时情形时,曾这样回忆:“善钟路离静安寺路很近,我经常到静安寺路‘公墓’去散步。里面有两棵法国梧桐,下面有两条长椅,我有时就靠在长椅上构思我要写的小说。”他所说的“公墓”,就是今天的静安公园;那“两棵法国梧桐”,不知今天还在否?

上海歌剧院主楼,原为陶氏住宅 张韵帆摄



善钟里的花园洋房 读史老张摄



剧联的秘密会议

地处法租界的善钟路,幽静、冷僻,很适合当年中共和民主人士开展地下活动。

女作家吴似鸿清楚地记得,她曾在善钟路恩派亚公寓(今淮海大楼),目睹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活动。吴似鸿早年参加过田汉的南国社,做过演员,被称为“南国社的野姑娘”;还写过小说,得到过鲁迅和田汉的赞扬。据她晚年回忆:“有一天,田汉叫我去法租界。我不知道他叫我去干什么,事先他没告诉我。他在前面走,我在后面跟……”一走就走到了善钟路霞飞路路口的恩派亚公寓,“田汉走进一间小房间,四周没有窗户,一张长方形的矮桌,四面已坐满剧联人员。最上面的位置,坐着潘汉年,骨架子好大,戴一副黑墨眼镜,田汉挤进坐下,再也没空位置了。我立在门口,便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因我不是剧联人员,便不跨进去了,嘻嘻哈哈地向他们打招呼。其中有一个人对田汉说:‘你叫她(指我)来干什么呢?’田汉回答:‘我叫她来掩护掩护的。’我这才知道,剧联在开秘密会议。”

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,张学良秘密到达上海。为了摆脱南京方面的跟踪,他请人在恩派亚公寓租了一个套房。套房里共有三个房间:正中是客厅,右边是卧室,左边是餐厅。在这里,张学良会见过不少爱国民主人士。有一次,张学良的一位部下那里,见张学良正和一位来客在谈话,当时因天气暖和,所以窗户都敞开着。“他们两人谈话声音很高,时而慷慨激昂,时而纵声大笑,谈了很长时间”,犹如多年的知心朋友。谈话结束后,张学良送客出门时,向部下介绍说:“他叫邹韬奋。”

1938年9月,潘汉年抵达延安,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。在此期间,他认识了抗大学生董慧。1939年,他与董慧经香港抵沪。据剧作家于伶回忆:“某夜,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‘盖世宫’(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咖啡馆)见面。要我在‘三友’浴室(今安福路‘和平浴室’)定好房间,他(指潘汉年)和刘晓同志来。谈了以后,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,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。”

偶尔谈起善钟路

1943年以后,善钟路被改名为“常熟路”。不过,普通市民并不习惯,仍喜欢沿用原名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作家唐大郎在12月7日的《亦报》上写了一篇短文,怀念曾经的小报《罗宾汉》,说它“没有色情,没有恶意攻讦人,浅显简单,老老实实报道消息”。为了证实“浅显简单”,他还模仿了一段《罗宾汉》文字,标题是《黄宗英担任保镖 唐大郎指点迷途》。全文如下:

昨天下午一时半,唐大郎坐了三轮车,经过善钟路转入葛罗希路,碰着黄宗英,骑了脚踏车,黄宗英跟在三轮车后面说,我做你的保镖。

黄宗英要到兰心打腰鼓,忽然迷失去路,唐大郎叫她跟到蒲石路,向东一指叫她一直去,不要转弯就到了。

上文中的“葛罗希路”,就是延庆路;“蒲石路”,就是长乐路;“兰心”,就是兰心大戏院。唐大郎称,他模仿的文字,就是“当初《罗宾汉》的遗风”,完全“写我自己的实事”。

在我看来,这段文字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文人间的一段趣事,也是关于“善钟路”地名的绝唱。后来,在各类报刊的正式文本叙述中,“善钟路”就被“常熟路”覆盖了。从此,只有老辈的人们在聊天时,才会偶尔谈起“善钟路”……